

“民主和平论”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

倪世雄 郭学堂

内容提要:“民主和平论”在冷战后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战略中影响颇深,这不仅是因为该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并被部分地运用于西方外交实践,而且冷战的结束以及对西方有利的国际形势也为其发展和实践提供了时代契机。“民主和平论”的中心论点是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从不发生战争,为证明这一观点,该论从历史事实和国家政体的作用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然而,冷战后的事实表明,它只不过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提供依据而已。在冷战后所谓美国“领导的”世界上,“民主和平论”有很大的市场,它对美国制定外交战略仍有一定的影响。

倪世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郭学堂: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

通讯地址: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200433)

“民主和平论”产生于80年代初,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开始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受到关注。尤为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理论依据,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决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美国“民主”外交的挫折和失败,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也接连不断。本文针对“民主和平论”产生的背景、发展、内容和实质,结合冷战后美国外交进行初步的认识和剖析。

一、“民主和平论”的产生和发展

“民主和平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18世纪末,随着西欧主权国家的不断出现,西方哲学家尤其是伊曼努尔·康德在

批评绝对主义权力政治和继承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等思想的同时,就提出了由自由国家联合起来建立“永久和平”的设想。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他把道德法则和人权思想运用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认为要建立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就必须坚持国际法的原则,主要是主权独立、维护和平和遵守道义。宪制共和国内部的监督和平衡作用可以防止统治者冒险地对外发动战争,同时每个共和国政府是否遵守国际法也可以暴露其战争动机。由于共和制国家比其他政体更乐意接受一个和平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因此它们更为和平,并强化“建立在自由国家联盟之上的国际法则”。在这个和平联盟内部,战争是非

法的。康德的“永久和平”方案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他以抽象的道德法则作为政治思想的基础,由此所产生的理性国家观、共和主义、和平主义对后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末的百年时间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仍没有摆脱古典哲学和政治思想的窠臼,在民权与主权的概念里徘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才真正把早期西方哲学家、政治家的道德规范和理性原则的政治思想运用于国际关系,并形成了风行一时的社会科学思潮——乌托邦主义。以此为基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学派应运而生”。康德虽然提出了以法则创造“永久和平”,但对于政府的行为他却束手无策。理想主义以“道德要求”和“民主原则”为核心,把一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体结合起来,认为政府体制决定了一国是否好战。具体来说,独裁体制要比民主体制更具有侵略性,原因是独裁者可以不经民选立法机构的同意而按其意愿采取军事行动。民主包含着多数人的统治和少数人的权力之间的严格标准,尊重法律而不是权力的价值体系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秩序和稳定的最可靠保证,因此,国家道德标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理想主义者主张恢复规范,健全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建立国际性机构和组织,以国际集体安全防止战争的发生。理想主义又称之为“威尔逊主义”,它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第 28 届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核心就是“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根据他的见解,用道义力量控制国际关系,用理性压倒公共舆论中的无知和狂热,才会向一个有秩序的国际社会迈进。美国在世界性事务中正是扮演着这种“传播文明”的角色。“十四点计划”是他在美国登上国际舞台后第一次为世界和平设计的蓝图,是美国外交史上要

求干预全球事务的首次表态。虽然威尔逊主义过于理想化,但它毕竟第一次把美国民主与世界和平结合起来,为以后的美国外交定下了基调。用陈乐民先生的话说,“重要的是威尔逊主义先于现实提出了美国外交的走向,它的影响不在当时,甚至不在二、三十年之内,而在于长远。”

“民主和平论”不仅继承和发挥了卢梭、康德以及威尔逊的自由、人权、民主政治思想,而且直接承理想主义之衣钵,得出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的结论。这种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切尔·多伊利。1983 年他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事务》一文中提出自由民主国家相互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的论点。多伊利把康德的思想称作是“远见、政策和希望的源泉”,并以康德的政治思想为依据解释说,民主政府相互间不愿打仗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必须向其国内的人民作出交代,如果战争的代价过高,它们在选举中就会失败。同时,在民主国家中,

见康德:《论永久和平》,(美国)印地安纳波利斯,自由艺术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17 页。转引自大卫·斯佩罗:《自由和平毫无意义》,载(美国)《国际安全》1994 年秋季号,第 52—53 页。

参见倪世雄等著:《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1 页。

阿瑟林克著:《威尔逊——新自由》,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6 年,第 278 页。转引自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97 页。

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第 188 页。

在多伊利之前,也有人提出过自由民主国家无战争的观点,如 1973 年比特·沃伦斯泰恩的《结构与战争:论 1820—1968 年的国际关系》一文,但是,这些文章不能被看作是对某一特定理论的论证。参见《国际安全》1994 年秋季号,第 50 页。

关于战争的外交决策是透明的,公众和决策者都对战争代价非常敏感,因此可以公平辩论。另外,他认为,民主国家相互间有用和平方法指导政治竞争和解决纠纷的共同愿望,这种“共识”要求双方“协调”相互间的关系,通过彼此尊重和合作,扩大接触,这种共同愿望最终导致利益共同体的产生。随着民主国家走向一体化,它们抛弃了在相互交往中使用甚至威胁使用武力的选择。

自从1983年多伊利提出自由民主国家相互间从不打仗的观点后,这种民主和平观倍受西方社会的青睐,被认为是“最接近于国际关系的经验法则。”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巨变,以和平方式走上了所谓“民主化”的道路,西方国家把冷战的“胜利”归功于它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民主的政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宣称,“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到来。也有人甚至认为,“至少从17世纪以来,现实主义原则(无序、国家安全困境)一直排斥自由主义或理想主义原则起主导作用,现在民主和平观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取代现实主义原则是可能的。”

二、“民主和平论”的内容

“民主和平论”的中心论点是民主国家很少(或从不)相互打仗。为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性,该理论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并提出了2个基本观点:第一,在民主国家之间如同其他政体之间一样存在着许多利益冲突,但是,毫无疑问,民主国家认为战争不是解决它们之间纠纷的合适方法;第二,尽管自由民主国家很少(或从不)相互打仗,但它们可能和非民主国家打仗。

“民主和平论”提出了3个主要概念:民主和平、民主政治和国际政治系统,认为

单位层次上的民主政治结构(自变量)与民主和平(因变量)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民主和平论”把这种因果逻辑归结为民主国家存在着政体上的两个根本限制因素,一是把民主国家间无战事归因于机制上的限制,即公共舆论或国内政治机构的监督与平衡对政府决策的制约作用;二是民主标准和文化因素,即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特点。这种“精神气质”表明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以战争或战争威胁手段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相反,民主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却缺少这些标准和限制因素。布鲁斯·鲁塞特则把上述两种制约因素按照特点的不同划分为两种“模式”:文化或标准模式(cultural or normative model)和结构或体制模式(structural or institutional model)。就第一种模式来说,由于受到国内限制,决策者尽力遵守解决冲突的准则(妥协和非暴力),同时他们希望其他国家的决策者也会这样做。民主国家中民主文化的约束力证明了“民主和平论”的上述第一个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唯一的可能性是民主国家出现政治不稳定,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这种模式还决定了上述第二个基本观点的正确性。由于非民主国

米切尔·多伊利:《康德、自由主义遗产和外交事务》,载《美国《哲学和公共事务》,1983年夏季号;另见他的《自由主义和世界政治》一文,载《美国政治学评论》,1986年12月,第1151—1167页。

杰德·利威:《国内因素和战争》,见罗伯特·罗特伯格和西奥·多兰布《主要战争的根源和防止》,波士顿,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8页。

塞缪尔·亨廷顿:《20世纪末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奥克拉荷马出版社,1991年。

鲁塞特:《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章;另见他的《民主和平可以建立吗?》,见《美国《国际交流》1993年春季号,第277—282页。

家的决策者使用暴力或强制手段对付民主国家,结果导致民主国家(肯定)对非民主国家的行为表示怀疑,并采取“非民主”措施即使用武力对付非民主国家。

相比之下,结构或体制模式认为,民主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不常发生是受制于民主政治体系和相关的监督平衡作用,以及决策者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得到绝大多数公众的支持。然而,非民主国家之间或民主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发生,原因在于非民主国家并没有这种结构上的限制。

以上两种模式或两种限制因素是“民主和平论”与主张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根本区别,归纳起来,主要是对国内政治结构和国际政治系统的关系认识不同。“民主和平论”认为,基于国内政治机构对于一国对外行为的重要性,要达到国际政治的和平状态,就要先从国家的“民主化”着手。现实主义则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内部发生变化,国际政治体系的无序状态也是不会改变的,系统结构是国际政治结果的主要决定因素。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肯尼思·华尔兹说,国家之间面临着安全上的困境,在这样一个国际政治的“自助体系”中,“竞争的压力要比意识形态倾向或国内政治的压力更为重要”。在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世界上,生存和安全只要面临着威胁,民主国家对民主国家对手和非民主国家的反应就没有什么不同。

三、“民主和平论”对冷战后美国外交的影响

随着冷战的结束,民主和平的呼声甚嚣尘上,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冷战的胜利是自由民主制度的胜利。“民主和平论”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相结合,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柱,这也是“民主和平

论”倍受西方政治家青睐的原因之一。

1983年多伊利提出建立民主“和平区”的设想时,并未受到多大的注意和支持。但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的民主和平观得到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重视和赞许,一些评论家迫不及待地提出,向外输出和促进自由民主思想应当成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弗朗西斯·福山大呼“历史的终结”,认为“在过去几年里,全世界都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它不仅战胜了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而且在最近还战胜了敌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格局发生彻底转变的情况下,美国的学术界和政界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在冷战后没有任何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敢于向“自由民主制度”提出挑战,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自由民主制度是民主和平的前提和可靠保证,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推行自由民主制度将意味着世界“永久和平”的到来。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扩展战略”正是基于“民主国家间无战事”和“市场经济可以推动民主化”两种观点而制定的。民主和平论是其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

克林顿政府在入主白宫前,就宣称“民主国家并不互相进行战争”是“颠扑不破的

鲁塞特:《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1993年,第35页。

肯尼思·华尔兹:《对批评者的答复》,见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29页;还可参见《国际政治理论》,安迪逊·韦斯利出版社公司,1979年。

约苏华·马拉奇科:《输出民主:完成美国的天赋使命》,华盛顿 AEL 出版社 1991 年;勒内·戴尔蒙德:《促进民主》,见《美国》《外交政策》,1992 年夏季号,第 25—46 页。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纽约自由出版社 1992 年,第 11 页。

真理”，“民主国家在贸易和外交上结成更好的伙伴；民主国家尽管有内在的问题，但为保护人权提供了最好的保证”。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进一步使美国的“民主和平”外交具体化。他认为，美国的安全决定于外国政体的性质如何，并提出用扩展战略代替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即“扩展全世界由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他的扩展民主论主要包括4个组成部分：第一，加强主要的市场民主国家；第二，巩固新生的民主和市场经济；第三，反击侵略、支持与民主和自由市场敌对的国家自由化进程；第四，通过在人道主义问题最严重的地区推行民主和自由市场，继续人道主义的任务。美国政府在推行民主外交的时候，越来越强调美国安全应与其他国家的政体，尤其是非民主国家的体制联系起来。

“民主和平论”在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过程中得到运用，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被冷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把90年代看成是扩大“民主阵营”的最好时机；二是在“一超多强”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和霸权地位正在动摇。以推行民主和平为幌子，可以给他们所认为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价值观即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披上合法的外衣，以掩盖其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强权的本质。具体说来，冷战后的美国“民主外交”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通过自由和民主思想扩展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把民主外交作为美国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美国政府重申美国的价值观诸如个人自由、宽容是民主制度的具体表现，强调国家的安全必须以扩大市场民主国家组成的社会、威慑和遏制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的威胁为基础，保护和加强美国的价值观是其安全战略的最终目的。因为，“民主和政治经济

自由化越是能主导世界，我们的国家就越安全，我们的人民就越兴旺发达”。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世界走向自由与民主的作用，据此把民主外交视为领导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我们的最大实力是我们的思想的力量，在世界各地，我们的思想正在被接受”。向外传播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既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最终目的，也是美国试图领导世界的新策略。

第二，美国的民主外交从一开始就带有干涉他国内政和推行强权政治的特点。在索马里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念念不忘传播美国民主和价值观的美国军队曾因干涉他国内政而最终狼狈撤出；为在欧洲建立“民主和平区”，美国大力推行支持东欧“新生的民主国家”的北约东扩战略，但此举遭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在东亚地区，美国不顾自身人权状况的缺陷，大肆指责一些东亚国家的所谓“人权问题”；尤为霸道的是，美国不允许其“后院”出现与其政经体制不一致的国家，以联合国的名义不惜在海地使用武力“护送”民选总统回国执政；而最近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更是无视国际法准则，悍然推行强权政治的霸权主义行径。民主外交打着“自由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招牌，使干涉他国内政和霸权行径更具有隐蔽性。

第三，美国的民主外交仍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总体说来，冷战后国际

克林顿在乔治敦大学发表的对外政策演说，1993年1月18日。

安东尼·莱克在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演讲，1993年9月21日，转引自亚历山大·纳赫特的《美国外交战略》一文，载《华盛顿季刊》1995年夏季号，第197页。

1995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扩展和接触》报告，正文第2页。

克林顿就职演说，1993年1月20日。

关系中意识形态的斗争虽然有所淡化,但并不意味着西方外交也因而摆脱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只不过针对的对象有了新的侧重。现在的意识形态斗争不仅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甚至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在苏东社会主义体系解体后,西方大国在意识形态的攻势更盛。它们的最终目的是迫使所有不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发生“转变”。究其实质,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准则常常被用作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和施加政治影响的手段。

四、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 与冷战后美国外交

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是随着它在美国外交中的运用而出现的。冷战后的世界形势变化多端;一方面,美国仍然是独霸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另一方面,众多大国的兴起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美国的民主外交遭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和抵制,有时美国也因推行这一政策而碰得头破血流。这使人们对“民主和平论”的论点和应用的目的产生了怀疑。

1995 年《欧洲》杂志曾专门就“民主和平论”组织了讨论会,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就“民主和平论”的内涵、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及其实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此后,也有学者通过民主与暴力的历史回顾,对“民主和平论”进行了批驳,认为在评析民主与和平的联系时,不能忽视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暴力、战争的关系,民主和平并不能从以往的历史经验中得到有效的验证。我国学术界对“民主和平论”的分析和批评有了深入的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民主和平论”的批评各有重点、各有所指。探究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民主和平论”的基本出发点的批评,这也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根源区别。“民主和平论”坚持认为国家内部政治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而现实主义则认为,国际体系机构更为重要,“民主和平论”颠倒了国际体系限制和国内政治机制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国家安全困境因素,一个国家在没有外来威胁或外来威胁很小的情况下,更趋向于自由民主制度;而一个生活在高度威胁的外部环境中的国家则更可能选择集权或其他非民主形式,国际体系结构不仅是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且也是形成国内政治体系的重要因素。

第二,对历史经验事实的批评。“民主和平论”认为自 19 世纪初以来,除个别情况外,民主国家间从不(或很少)发生战争。然而,统计数字表示,在 1816 年至 1980 年的 100 多年间,战争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而恰恰与“民主和平论”的看法相反,民主国家间经常发生以战争相威胁的情况。克里斯托夫·莱恩就 4 个具体的“个案分析”证明,在战争危机中,民主国家为了战略利益和荣誉,至少有一方准备打仗,战争并不是因为“你生存也要让别人生存”(Live and Let live)这一“民主和平论”的精髓而避免,而是因为一方实力不够强大而作出让步的结果。看来,现实主义理

参见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第 8—17 页。

见李少军的《评“民主和平论”》和《关于“民主和平论”问题讨论发言摘要》,载《欧洲》1995 年第 4 期。

朱立群、王妙琴《评“民主和平论”——民主与暴力关系的历史回顾》,《外交学院学报》,1996 年第 1 期,第 55—59 页。

参见莱恩《民主和平的神话》,第 45 页。

参见大卫·斯佩罗:《自由和平毫无意义》,第 50—86 页。

论更具有说服力。同时“民主和平论”也不能解释民主国家发生内战的情况,如1861年—1865年的美国内战,“如果民主标准和文化没有防止民主国家内战的发生,还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们可以防止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呢?”。

第三,对“民主和平论”的两个基本观点的批评。民主国家由于机制和民主标准与文化等方面的限制,相互间倾向于用和平手段解决彼此间的纠纷和冲突,但事实往往出现“反常”情况,即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一样好战(这里暂且不论非民主国家是否真的好战和内部缺乏稳定性),民主国家如美国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就曾出现民众热衷对外开战的情况。可见,“民主和平论”中的这一因果逻辑并非无懈可击。再者,“民主和平论”把民主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归因于后者缺少民主文化和机制上的制约因素,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人民真的不愿打仗,不愿承担战争的巨大代价的话,那么民主国家就不会进行任何战争,包括与非民主国家的战争,民主制度的制约作用应具有普遍性。由此可见,民主和平理论的第二个基本观点在逻辑上也是错误的。

另外,关于民主概念的界定问题也是批评者的依据之一。一个国家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是“民主”的呢?正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欧伦所分析的那样,美国划分民主与非民主的标准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并不客观。美国把自己的朋友看作是民主的,把自己的敌人看成是不民主的,这使“民主和平论”难以具有说服力。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历史经验难具说服力的情况下,西方学者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论调,他们以俄罗斯和其他前苏东国家为例,通过大量数字试图证明,在现实政治中,许多非民主国家正在“民主化”,在向

民主过渡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对民主国家更具侵略性和好战性,而专制国家更具稳定性。“事实上,民主参与不断增加的集权国家比稳定的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更可能对外发动战争”,“那些跳跃性最大的国家在进行民主化后的十年内对外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是那些专制国家的两倍。”因此,长远看来,推动民主的传播是可能带来世界和平,但短期来看,这种做法有导致战争的危险。这种新论调从经验事实方面既批评了“民主和平论”中非民主国家好战的观点,又为其进行了辩护,把战争归因于正在“民主化”的非民主国家身上。很显然,这是为克林顿政府陷入困境的民主外交出谋献策。美国不是不要“民主化”,而是不要急于推动“民主化”。就目前情况来说,这种论调对冷战后的美国民主外交更具现实性,更可能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

在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战略中,以自由民主思想为内容的理想主义成分非常浓厚,民主外交是理想主义思潮的具体表现。从索马里、卢旺达到波黑、海地,美国政府不失时机地推销其民主制度和价值观。这种“干预主义”不乏成功的例子,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越来越脱离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现实。北约东扩的目的是把刚刚走上“民主道路”的东欧国家拉入西方社会,以保护它们脆弱的民主制度,然而,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的事实证明了权力政治仍在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中美关系中,美国不顾自身的国家利益挑起“人权”问题之争,也使美

见莱恩《民主和平的神话》,第41页。

艾都·欧伦《“民主”和平的主观性》,《国际安全》1995年秋季号,第147页。

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杰克·斯奈德:《民主化和战争》,见美国《外交事务》1995年5—6月号,第79—97页。

国的民主外交遭到强烈的抵制和挫折。

近年来,美国国内对美国政府的民主外交的批评不绝于耳,批评家认为,美国政府必须权衡民主外交与现实权力政治之间的关系。199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批评美国政府把美国的希望与愿望混同于美国的利益,“促进自由市场的发展,支持民主的发育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它们并不是绝对的目标”,美国的“长远利益必须要摆在短期扩大民主的理想的前面。”美国前国务卿亚力山大·黑格说,美国必须在现实政治和美国的价值观之间保持平衡,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向“有利于像人权这种理想主义价值观的关键利益的方面转变”,而若将人权作为对外政策目标的唯一核心将会失败。美国学者把克林顿的“和平伙伴计划”看作是推行威尔逊主义的危险事例,因为北约东扩将会导致美国陷入与俄罗斯等国的未来地区冲突的危险,“和平区”只是幻想中的和平。在中美关系中,美国的“人权外交”连遭失败,美国密执安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教授认为,美国必须抛弃对华政策中的理想主义成分,代之以现实主义的政策。

从理论上讲,自从20世纪初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始终是理想主义民主价值观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混合物。在美国外

交中,推行民主制度和追求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直存在,只不过在冷战后前者的色彩更浓一些,并且在遭到后者的挑战后,又倾向于优先选择国家利益的特点。近来,克林顿政府也在部分调整其对外战略的重心,尤其在亚太地区,注重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趋向越来越突出。但是,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美国的对外政策只能在理想主义和现实政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只能在注重民主价值观和注重国家利益两者之间左右徘徊,至于在某一时期里孰轻孰重,要根据具体的国内外形势而定。冷战结束近10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依靠其绝对实力和地位,不会轻易放弃推行西方民主和价值观的政策,“民主和平论”仍有很大的市场。

(本文责任编辑:刘 绯)

多尔:《决定美国在全球的未来》,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5年春季号,第38页。

合众国际社新加坡1996年2月5日英文电。

莱恩:《民主和平的神话》,第47—48页。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1996年5月27日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座谈会上的发言。